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901004

网络批评性话语的勃兴与国家治理:困境及应对

王 蒙

(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摘要:“网络社会的崛起”使中国的舆论生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当前由于社会政治矛盾、文化与意识形态整合困境、政治机会环境、新媒介平台、网民群体心理等因素,我国网络批评性话语方兴未艾,给政治秩序的稳定带来了一定挑战。我们有必要正视其成因,并不断完善因应之道,以期构筑合理的公共空间与实现稳定的国家治理。

关键词:中国;网络;话语;批评性话语;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9)01-0017-05

21 世纪以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也波及了中国,国内舆论生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媒体上尤其是互联网上批评性话语日益增多,给政治整合和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我们有必要正视和详细分析网络批评性话语勃兴的原因,并不断完善因应之道。

一、网络批评性话语的勃兴

按照流行的语言学定义: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它也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1]福柯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话语是一种言说,也是一种姿态。批评性话语是指民间舆论对政府、体制、政策、官员作为等的批评与指责。它是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或反抗,是“主人”对“公仆”的规训,以舆论“合法性危机”倒逼政府改进和政治改革。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既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民间舆论汹涌,批

评性话语勃兴,而其主要场域在互联网。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包含批评性舆论)的重要发源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7.53亿。当前互联网普及率为55.8%。^[3]在网络媒体如此发达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空前的普及,社会各阶层都已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表达个人观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统计测算,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最具影响力的10家网站上,网民每天发表的论坛帖文和新闻评论达300多万条;微博每天发布和转发的信息超过1.5亿条。^[4]

当今民间舆论中存在明显的批判现实主义,新媒体上更是充斥着政治批评的声浪,挑战着原有较为封闭的和自循环的话语系统,与官方正统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存在“两个话语场”^[5]。民间政治诉求和政治批评(特别是关涉民生热点问题和易引众怒的极端事件)进入媒体议程后,往往会形成声势浩大的“广场效应”,集聚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及其官员修正行为乃至改进制度。

收稿日期:2018-10-16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SJB0404);南京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YKJ201436)

作者简介:王蒙(1984—),男,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

网络批评性话语的主要载体有门户网站评论专栏、博客、微博、QQ、BBS论坛、新闻跟帖、学术性网站、网民公开信等。其中,社会时评——即网民通过门户网站、BBS论坛、博客、微博、QQ、新闻跟帖等途径表达的批评性话语,涉及面广,内容繁多,语言犀利。学术性批判则是具有社会介入性的人文社科类学术网站的论点公开。他们往往既具有理论批判性,又具有现实针对性,以学理逻辑对抗某些不合理的政治宣示,并给大众以现代公民“启蒙”。特定公民或代言人士还通过发布带有一定挑战性质的公开信来进行政治批评,这在近年也时有出现。如:籍贯山东济宁的清华法学博士就自家被违法拆迁问题致家乡市长公开信;长沙市民彭北京因怀疑司法不公而发布公开信要求与主审法官“决斗”;知名媒体人陈杰人发布《就拘留送锦旗者致长沙市长张剑飞的公开信》;温州等地市民集体发布悬赏文告,“邀请”当地环保局长下河(河流已被长期污染)游泳,等等。

批评性话语表达的具体形式有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而话语批判路径则有两条。一是(自我)建构,即建构独立的话语体系和独立渠道。现在,新闻议程已更多地由迎合社会口味的大众媒体设置,甚至普通公民也可在公共论坛上凭借被热“顶”的帖子来取得议题设置权,或者通过个人博客、微博等直接设定话题和向众人传播,舆论议题与传播渠道不再由官方垄断,而其中许多议题恰恰是针对政府的不合理不合法行为的。商业网站也纷纷开设新闻评论专栏(如搜狐评论、网易评论、腾讯评论、凤凰评论等),对涉及官方行为的新闻时事进行即时报道和评判。同时,网民还创造出了新话语体系,开展了一场热闹的“民间语文运动”,系列网络新词如“河蟹”“欺实马”“俯卧撑”“楼跪跪”“躲猫猫”“你懂的”“被XX”“恨爹不成刚”等出现。这些新词的含义由网民大众界定(多含讽喻),更新速度由网民掌控,使官方不知所从、疲于应付。除了新语汇外,还有虚拟说唱、讽喻图片、恶搞视频等。网民以幼稚化语言和调侃戏说以及恶搞作品反叛成人世界和权威话语,以微妙的准政治言说反抗现实政治,已初步形成一种区别于官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新话语形式。二是解构(他者),即借助官方报道渠道而通过新闻跟帖等形式填入异质内容。表现为对官方新闻发布的再发布、评论的再评论。网民在新闻事实、表达逻辑、事件的道德价值等诸方面

与官方话语展开竞争,或针对不实宣传而提出真实消息,或针对片面说辞而发布全面信息,或针对官僚逻辑而抒发民本关注,或针对“假大空”的讲话而讽刺调侃。在很多情况下,官方话语的正文文本已被社会话语的反向跟帖湮没,原本政府对社会的宣教转变为社会对政府的批评。这种情况较为普遍和常见。^[6]

二、网络批评性话语勃兴的原因

为何当代中国的网络批评性话语方兴未艾呢?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矛盾因素。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叠合,社会诉求与抗争话语增多,所谓“社会剥夺”——“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引发了大量利益表达诉求。通常认为,中国当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由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相对剥夺感,这是一种不可轻视的社会不满。而一定数量的绝对剥夺也会导致社会抗争,比如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司法不公导致的对公民生命或财产的非法剥夺等。社会转型期的其他民生问题也使民众在媒体上的批判火势熊熊。虽然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然而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却也使其压力颇大,这些都会在网络上喷发出来。另外,直接的官民冲突亦是政治批评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多项调查报告一致显示,受调查者均将“官民矛盾”列为各种社会矛盾之首。^[7]部分官员的非法行为或官僚主义作为,经常成为舆论“引爆点”。通过媒体报道集中和放大,各种“小恶”不断被揭露,尤其是基层出现官民直接对立冲突的事件(比如“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时,舆论往往一边倒,网络新闻的跟帖常达数万甚至数十万,显得群情激愤。

二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整合困境。网络批评性话语的增多也源于公民文化的变化以及意识形态整合困境。具体而言:第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宏大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民间政治心理在“文革”后经历了祛魅,再加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现在是相当的功利化、世俗化了。住房商品化、土地承包、个人持股等私有产权的历史性进展也使得公私利益区别明显,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被谨慎接受,民族主义的社会整合力与思想统

一力相对下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开放性。第二,家庭父权制文化式微,青少年新世代的话语权增大,对政府和权威的态度更加理性,甚至存在较为普遍的政治逆反心理和批判心态。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使得基于传统小农社会形态的父权制文化急剧衰落,独生子女一代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显著增强,权威人格明显弱化。再加上信息化和全球化大潮的涌流,“互联网一代”更是生来具备了较之于上代人更强的知识更新和技术操作优势,对经验和顺从的尊崇下降,对创新和颠覆的向往加强。作为网民主体的年轻人通过话语恶搞和“山寨”等方式对官方“话语霸权”提出了挑战,对政府的负面作为进行了无尽的调侃与辛辣的讽刺,并往往成为文化事件。第三,官民体认存在一定隔阂,老百姓变成“老不信”,政治信任感有限。^[8]一些地方政府和部分官员信用度较低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官员脱离群众,明显违背了党的“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原则,话语宣示与其实践的距离过大,利益区隔和心理落差给大众造成虚伪印象,难以得到认同。第四,意识形态的“共时性危机”和多元化危机。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时代,客观存在着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在国际上承受着较大的政治心理压力,西式“自由民主”大行其道并对中国施压。一些国人接受了西式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为标准批判国内政治。另外,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对国外政治和社会情况的介绍也越来越多,一些方面与国内形成了对比(尤其是廉政方面和民生方面),国民容易提出诸多批评(尽管往往失之于简单化)。这种共时性报道与网民的“价值先行”心理促成了过度的批评浪潮。

三是政治机会环境。西方学界的“政治机会理论”将“政治机会”环境看作是社会运动或社会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义体制已明显松绑。在之前的社会舆论过程中,由政府控制“由谁说”和“说什么”。而如今,互联网言论自由化、多元化的倾向却十分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更愿借此倾听民意和监督官员队伍而有意开放网络(是“开放”而不是“放开”),“安全阀”效应又有利于社会情绪的发泄和社会政治稳定。这种政治控制的松动,给社会话语的表达、抗辩甚至是“反叛”行为以一定的空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高层明显加大了利

用网络进行政权肌体清理的力度,对网络监督和批评给予了更大的宽容度。当然,我们也看到,正是现实中制度化的司法监督与民意表达渠道仍有所不畅,虚拟网络世界才成为绝佳的替代场所。

四是商业媒体的兴起与新媒介“技术赋权”。追求新闻理想并带逐利动机的商业媒体的大发展,客观上有助于批评性话语的兴起。改革开放新时期,官方媒体一元化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社会资本逐渐进入媒体领域,非官方社会化媒体蓬勃发展。在互联网上,既有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主流媒体,更有搜狐、网易、新浪、腾讯、凤凰等几大商业门户网站,天涯、猫扑等bbs论坛,QQ、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后者所占有的网民数更多,话语影响力也往往更大。商业媒体的崛起,使中国的新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利润导向的“眼球经济”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典型事件的报道以及“添油加醋”客观上导致了“眼球政治”。一些互联网媒体由于营利驱动或立场原因等,轻视社会责任,偏好负面情绪表达,“炒作”角色凸显,有时不尊重甚至故意扭曲新闻事实(比如“标题党”等),而市场机制又更欢迎极端话语,网民好忧不好喜,往往在舆论中形成对政府和体制的批评性氛围。^[9]同时,扎根并依赖于大众媒体的民间“舆论领袖”(比如微博“大V”)也往往出于各种目的,扮演了率先披露真相和批评公共政策乃至体制的角色,通过“二级传播”推动了相关舆论浪潮的形成。而互联网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新型媒介,具有传播即时性、广泛性、平等性、互动性、多媒体性与难控制性等特点,可以对民众“技术赋权”,使民间批判更具可行性。网络媒体给与大众表达以充分的渠道支持,不仅有“他媒体”(比如网络论坛、新闻评论版块等),还有“自媒体”(比如博客、微博、微信等)。网民还拥有了“云智慧”的知识优势、“代表人民”的规模优势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快闪”优势。普通民众开始有机会对各个层面的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诉求。比如微博。“微博改变了这种局面——信息和新闻由官方媒体垄断的局面……被封闭的舆论空间长期压抑着的民意与诉求,像是决堤的洪水,泛滥奔涌而出。一时间,饥渴的民间个体声音,透过微博这个更自由的平台,得以被释放出来。他们表达不满,发出呼吁,也成为公共事件的当事者。”^[10]而在匿名状态和信息技术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要对信息全面和即时拦截是十分困难

的。社会抗议话语可以较容易地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并可在短时间内获得广泛认同。

五是网民群体心理因素。网上批评性话语的勃兴也和网民群体的某些特质是分不开的。比如“破窗效应”与“蝴蝶效应”。一旦有少数人在网上表达了某种政治批评而未受到追究,也即批评性话语是安全的,随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并且将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不满以及平日对政府的各种意见叠加,共同进行揭批,逐渐“蔚为大观”。这是有传染性和暗示性的。再比如“狂欢”心理。巴赫金等提出的“狂欢”理论精妙地展示了常态生活中受压抑的人群将在特殊时空的“突破口”进行颠覆性欢闹的规律。网民摆脱了日常面具的遮拦,在虚拟世界实现社会重组和群体重聚,嘲弄规则,恶搞权威,颠倒世界,负面发泄,进行半正式的挑衅与批判,可以获得另一种慰藉和满足。还有“群体极化”规律。网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它与政治权威疏远,与草根大众接近,表达个性化,追求志同道合者。共享某种话语体系的网民所积聚成的虚拟社群进行自我“教育”,并与其他社群进行区隔,其环境的发酵感染可以使成员思想和行动激进化,对立更加明显,且突破单个人的行为禁忌,陷入更加愤怒和极端的状态,话语表达也就更加“出格”。

三、网络批评性话语勃兴的影响及其应对

网络批评性话语的增多,从虚拟世界传导到现实社会,给予了政府更大的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焦虑,同时给了它更大的改革动力——尤其在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正如传媒学者所指出的,“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11]。它能促使政府更多地了解民意、倾听民怨,更好地集中民智、发挥民力。网络批评性话语通过不断地“议程设置”,发掘治理议题,引起公共关注,提出各种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及其意见,促进相关政策的改进;通过互联网“扒粪运动”,广泛传播揭露性话语(即针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当行为的消息曝光),利用“阳光效应”和“围观效应”迫使政府做出相关解释或修正不合法不合理行为,实现“人民”对“公仆”的规训,以“合法性危机”倒逼政府改进;初步形成了对政治权力运行的全方位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力”,强化制度权威与规则精神,增进公共生活的

公共性和政治生态的均衡性。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汹涌的民间网络批评本身亦有其局限,批评性话语在理性方面也有待提升。客观而言,网络批评话语既有真知灼见,也有民粹、急躁倾向;既有反映事实的一面,也有信息不全的一面;既有有利于社会治理的因素,又有危害社会稳定的可能。据《求是》杂志社的研究成果显示:网络社会话语具有非主流性——浏览者多而参与者少;负面性——批评的多而肯定的少;非理性——情绪宣泄多而理性思考少;逆反性——挑战权威和普遍排斥。^[12]观察者也指出:当下,我们之间充满了不平、躁动、怨忿、戾气。论坛、微博等平台经常被那些戾气充溢的言论带动情绪,交往沟通理性匮乏,破坏了转型社会的历史进程。^[13]网络舆论更可能被各方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操纵,丧失独立性,形成“伪舆情”。^[14]

作为政府而言,并不是也不应该被动地旁观网络政治批评的拓展与发力,而是可以做些积极主动的努力,毕竟社会行动的“结果取决于它们的广度和社会精英及其他群体的反应”^[15]。令人欣慰的是,官方已然意识到了网络舆论兴起的潮流,也日益重视其对于权力监督制约和推进各项改革的作用。我们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缓解社会矛盾,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等领域纾解民生之困,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继续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反对“四风”,巩固反腐败斗争已取得的成果,清理各种特权现象,促使政府形象与政治信任感的提升。现实矛盾的解决才是网络批评减少的基础。二是提升意识形态整合效力。将传统意识形态刷新,更多地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寻求最大共识,突出新时代的共同理想的感召,同心共筑“中国梦”,强化“四个自信”的宣传;践行新时期的群众路线(包括网上群众路线),增强“亲民主义”宣示,改进宣教策略,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政治传播形式,使之更符合新生代人群的接受习惯与文化口味,真正减少距离感;顺势而为,做好对外部意识形态的回应和化解,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等等。三是科学进行网络舆论的导控和互动。面对网络批评性话语的兴起,政府应摆正态度,尊重话语权利,理解话语诉求,做好话语沟通,回应话语意见,开放和解与感情拉近的大门。通过报道和宣传,进行话语主动

发布,以信息公开破除公众怀疑,以“自亮家底”减少社会批评。进一步实现政府官网和官微(官方微博、微信)的内容丰富化、界面友好化、反馈高效化,方便民众与之联通互动,实现话语无缝隙对接,减少隔阂。直面社会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引导民众摒弃偏激言论,吸收合理化建议,消除疑虑、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批驳谣言,增强正面引导,平衡舆论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16]重视和网络舆论领袖这一“新社会阶层”交朋友,将其纳入新时期统一战线,促进虚拟场域的协商民主,共同谋划于新时代社会治理。相关部门应对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监测、搜集与研判,强化阵地意识和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扩大新媒体背景下的组织领导力与话语权,光明正大地进行“正能量”宣传。同时,政府还应应对网络虚拟话语空间进行依法规范,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等,以保障新型舆论场的秩序。

作为社会而言,应不断提升公民(网民)的理

性水平和媒介素养。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理性”尤为重要,也即需要构建平等沟通、相互尊重、真诚包容、利益妥协的对话机制。应使公民更好地理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了解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与基本精神。进一步加强基层训练与公民教育,让公民真正熟悉和理解决策过程,提高公民的互联网参与能力。还应提升自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提高对信息的辨认能力和分析能力,学会独立思考,客观评价,避免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强化新媒体平台的责任感与公信力。网络机构平台须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和自律意识,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做好舆论“把关人”,注重社会效益,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全面性,抵制和消除网络谣言,按照事实与逻辑疏导公众情绪,避免激化矛盾,增进社会共识,努力搭建理性讨论和良性沟通的平台,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提升社会治理的合力。舆论领袖(如网络“大V”)也要认识到自身所担负的“二级传播”的角色,认清自身的公共责任,预见可能的社会影响力,自觉规范自身言行,不夸大事实更不能捏造事实,不传播极端言论,和普通网民与政府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共同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

总之,政府需更加坦诚,社会需更加理性。网民的揭露、批评与规约,与政府的回应、接纳与互动一起,共同构筑公共理性平台,实现更高层次的政治整合与更加良善的国家治理。

参考文献:

- [1]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8-69.
- [2] 王治河. 福柯[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 [3] 佚名. 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8-03-01)[2018-03-01]. <http://www.cnnic.net.cn>.
- [4] 佚名. 中国微博账户达3.2亿 网络民意促社会公开透明[EB/OL]. (2011-12-09)[2011-12-27].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12/09/c_122400883.htm.
- [5] 魏武挥. 后媒体时代的两个舆论场[J]. 人民文摘,2015(3):24.
- [6] 王蒙. 互联网上的国家与社会:话语权视角[J]. 甘肃理论学刊,2012(4):49-53.
- [7] 吴忠民. 当代中国社会“官民矛盾”问题特征分析[J]. 教学与研究,2012(3):13-21.
- [8] 上官酒瑞. 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J]. 理论与改革,2011(5):24-27.
- [9] 王蒙. 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的政治整合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2012.
- [10] 姜北树. 微博上的革命[EB/OL]. (2013-08-26)[2013-08-2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hpl/2013/0825/90581.html>.
- [11] 祝华新. 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J]. 理论参考,2012(2):45-48.
- [12] 柯提祖. 网络舆论:民意的“自由市场”?[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9-02(02).
- [13] 余世存. 乖戾之气败坏我们的理性[J]. 中国新闻周刊,2011(43):83.